



中国共产党“红色”概念的语义流变与话语建构

——以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

江业菲,蔡 胜

(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1200)

摘 要:“红色”作为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革命话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红色”这一概念古已有之,其从视觉层面的颜色词汇转变为象征革命的政治话语,是社会变迁与跨文化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红色”在帝国主义话语、国民党话语以及国内社会认知中,被赋予了“过激”“恐怖”“共产公妻”等多重负面语义,“红色”由此沦为遏制革命的话语工具,使中国共产党陷入严峻的话语困境。面对语义困境,中国共产党通过语义承接、话语对抗、概念转向、体系构建的方式重塑“红色”的正面含义,构建起契合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际的“红色”话语体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构实践不仅为中国早期革命奠定了话语基础,也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红色;概念;语义;红色话语;20世纪20年代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8-0448-08

The semantic evolution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red" concep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ered in the 1920s

JIANG Yefei, CAI She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1200, China)

Abstract: "Red" is a distinctive revolutionary term unique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and it holds a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e concept of "red"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visual color term to a political discourse symbolizing revolu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social changes an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1920s, the term "red" was imbued with multiple negative connotations such as "extreme" "terrorism" and "communal marriage" in the discourse of imperialism, the Kuomintang, and domestic social perceptions, thereby becoming a tool to suppress revolution and plunging the CPC into a severe discursive predicament. In the face of semantic dilemmas, the CPC redefined the positive connotation of "red" through semantic continuation, discourse confrontation, and conceptual shift, thereby establishing a "red" discourse system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early revolutionary circumstances of the CPC.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CPC during this period not only laid the discourse foundation for the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 but also provided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red; concept; semantics; red discourse; the 1920s

收稿日期:2026-03-07 网络出版日期:2026-06-18

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大项目(2023sxzz014);安徽省中青年教师培养行动项目(JNFX2023001);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项目(sztshj-2024-6-5)

作者简介:江业菲(2001—),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蔡 胜,E-mail:2007500022@ahmu.edu.cn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诞生了诸多革命话语。其中“红色”是中国共产党极具标志性的革命话语。习近平强调:“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1]这深刻凸显了“红色”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意义。20世纪20年代以前,“红色”一经引入中国便被赋予革命、光明与进步等正面语义,成为表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凝聚进步力量的重要政治符号,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动员与政治认同建构提供了重要话语支撑。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红色”语义走向负面化,反动势力与部分社会群体对其污名化,形成对革命运动的舆论压制。对此,中国共产党有效破局,重塑“红色”正面内涵。

目前学界关于“红色”概念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陈良^[2]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红色”词义的演变历程,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苏全有等^[3]对20世纪上半叶“红色”由传统颜色词汇向革命政治概念演变的历史进程展开系统考察,揭示了外来革命思潮传入、国内政治博弈以及政党话语建构共同形塑“红色”政治意蕴的内在逻辑。张治江^[4]从“红色”的负面色彩出发,考察污名化的“赤化”的指涉对象和语义渊源,并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应对策略。王建伟^[5]则以北伐前后为关键时段,聚焦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斗争中对“赤化”与“反赤化”的评述,呈现出北伐时期军事对抗与观念竞争交织的历史图景。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大多以20世纪上半叶作为研究时段,且多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主体,考察“红色”语义的历史演变。然而,关于20世纪20年代“红色”语义从正面转向负面的内在逻辑,以及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及国内社会群体围绕“红色”话语所开展的博弈与建构过程,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鉴于此,本文聚焦20世纪20年代,通过梳理“红色”概念在20年代之前政治语义的生成与传播,及其在20年代之后被多方势力进行污名化建构的过程,探究中国共产党在多元语境下构建其正面内涵的具体实践,以期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方法论启示。

一、“红色”的缘起:从传统色彩到革命符号

“红色”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极具标志性的符号,其政治语义的孕育生成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这一过程为中国共产党后续的话语建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传统语义的积淀与20世纪初政治语义的生成

在中国传统语境里,“红色”最初以“赤”作为核心表述,其语义锚定在五行学说的架构内,随后与“红”这一表述交替运用,实现了从单纯颜色词向传统色彩符号的转变。“红色”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已然出现并被使用,多指代“火光明亮之色”,属于颜色词范畴。然而,古代意义上的“红色”最初并非以“红”来指称,而是通常用“赤”来表示。如《说文解字》中释义:“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凡赤之属皆从赤。”^[6]这里解释“赤”为“南方色也”,是由于受到了中国五行学说的影响,“赤”对应五行中的火,代表四方中的南,其字形由“大”和“火”组成,象征火光明亮的颜色。“红”本指粉红、桃红,后来“红”也表示赤、大红的颜色,“赤”与“红”通常可以交替使用^[7]。

20世纪初的“红色”与古代虽字形相同但语义相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它逐渐从单纯的颜色词衍生出具有政治色彩的语义,且在这一时期,其政治指向呈现出多元性,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这一演变标志着“红色”从传统色彩语义向政治维度的转变。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俄国立宪议题时,关注到社会主义革命党的示威运动情形:青年学生将革命标语书写于红旗之上,并振臂高呼“自由万岁”^[8]。1910年,《东方杂志》在对日本“赤旗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将“无政府共产革命”与“赤旗”关联的表述:“公然揭扬无政府共产革命之赤旗于路旁”^[9]。这一阶段,“红色”的政治象征对象并非单一的,而是涵盖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在传统语境中,“红色”语义经过长期的沉淀,在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其政治象征属性开始初步呈现。这既为“红色”奠定了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语义根基,也为中国共产党后续吸纳、重塑“红色”并赋予其革命内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话语资源。由此,这一色彩符号得以突破单纯的视觉与文化范畴,逐步进入服务于救亡图存和革命实践的全新语义领域。

(二)国际共产主义话语中“红色”的传入

“红色”之所以在20世纪初期发展出政治意蕴并得到运用,其渊源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激进革命党人皆戴一“红色尖顶帽”,被视为“自由的象征”^[10]。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蔓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日益扩大,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均采取红旗作为阶级斗

争的标志。

尽管“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已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通行,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旧词新义的概念,它被接受和运用需要一个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报刊对“红色”与阶级战争、国际主义关联的解读,为其政治语义在中国的深度传播提供了关键的认知桥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国内报刊纷纷报道革命经过及内政外交政策等,其中只提及“赤旗”,并未对其政治象征意义作出解释。如《东方杂志》描述俄国大革命的经过时,提到“民众手持赤旗,游行街市”^[11]。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杂志转译美报,其中赋予了“红旗”明确的政治内涵:“红旗者,阶级战争所用之标识也”,其意义超越了国家认同的国旗,有“千百万之人民愿投身红旗之下”,并称其为“推翻国家主义建造大同主义(即国际主义)之先声也”^[12]。这里的“红色”与“阶级战争”“国际主义”相联系,为“红色”的政治性含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国际视野。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对中国“红色”政治语义的认知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克思将“红色”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政权的核心标识,列宁结合本土文化进一步深化了其阶级属性与政治立场的内涵。二者共同塑造的“红色”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对“红色”语义的接纳趋向。五四运动期间,西方各类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对“红色”政治意义的接受与运用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里,“红色”是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权的象征,举起“红旗”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其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工人政府的建立”^{[13]603}。“红色”一词的用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主要有两种:一是将“红色”具象化,如“红色布带”^{[14]591}、“红色帽子”^{[14]407}、“红旗”^{[13]603}等;二是用于抽象概念,如“红色共和国”^{[15]153}、“红色共和党人”^{[15]489}、“红色国际”^{[16]9}、“红色恐怖博士”^{[16]274}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之上,融合俄国本土文化,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红色”的政治意涵。俄国东正教圣像画以红色为底色,其寓意为“永恒之美”。对于东正教徒而言,红色象征着基督受难时流淌的鲜血,代表着主用以洗礼子民的圣灵之火^[17]。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借鉴俄国文化传统中“红色”的语义,将其重塑为革命的象征。列宁提出,“黑色”用以指代比立宪民主党更为

保守的政党,“黄色”代表立宪民主党,“粉红色”则喻指社会革命党与社会民主党,同时明确指出,唯有坚定秉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将“红色”确立为自身的标志性色彩^[18]。列宁的这一话语体系表明,色彩已超越单纯的视觉符号范畴,被赋予了鲜明的阶级属性与政治立场。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红色”的政治意涵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标识。这一具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标识意义的政治符号,也对处于社会变革关键节点的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

国际共产主义话语中“红色”概念的引入,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契合革命需求的话语资源,更为中国共产党后续基于本土实际构建“红色”概念奠定了关键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红色”话语的译介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中国社会问题的进程中,更为深入开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并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率先洞察到“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并主动开展对其的话语译介与意义建构工作。当李大钊了解到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取得胜利时,他将其旗帜称作“赤旗”,军队称为“赤军”,此类革命称为“赤革命”^{[19]485}。由此可见,“赤”的政治含义彼时已传入中国,“赤”作为形容词可用于修饰旗帜、军队、革命、国际组织等对象,用以指代其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随着世界革命潮流涌入中国,社会各界曾对“赤革命”产生疑虑,而李大钊认为“无论是白是赤,总在本质稍有光明的国家,才能发见这样鲜明的颜色”^{[19]495}。在李大钊看来,“赤”并非单纯的政治标识,而是“光明”的具象化呈现,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紧迫需求。李大钊对“赤”的政治内涵进行了拓展,赋予其进步意涵。通过话语阐释与意义延伸,李大钊系统性地构建了“红色”的政治语义,对当时的青年学子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呼吁顺应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潮流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瞿秋白对于“红色”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1920年4月,他在《新社会》发表《劳动底福音》一文,认为“劳动能给人以完全的幸福……救我们的只有劳动!血呢?赤色化呢?”^{[20]82}这里瞿秋白认为“赤色化”是可怕的,是与战争后血肉模糊的尸体相联系的。1921年1月,瞿秋白前往俄国进行考察,通过对苏维埃政党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研究,其世界观发生转变。同年4月,瞿秋白发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一文,介绍俄国共产党组织问题时提到“赤色的星期六”,其意为“共产党的工人愿意无报酬在星期六做半天或几小时的工作”^{[20][201]},并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20][223]} 先进知识分子对“红色”政治语义的译介、阐释与认知转变,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铺垫了语义基础,更将“红色”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紧密联结,开启了“红色”话语中国化建构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治语义的生成是多重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在传统中国语境、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变革、国际共产主义话语传入以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译介的多重影响下,“红色”逐渐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并演变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红色”的污名:20世纪20年代的多重负面形象

20世纪20年代,“赤”所蕴含的政治意涵受到多方势力关注,通过添加动词性后缀衍生出“赤化”这一术语,并与“过激化”相关联。不同群体基于自身政治立场,对“红色”话语进行了差异化的语义构建。由此,“红色”一词被强加了多重负面语义,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话语困境。

(一)帝国主义话语下的负面语义:“红色”与“过激”绑定

在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中,“红色”并非天然具有负面语义,而是被帝国主义势力主动筛选、定义并建构为与“过激”深度绑定的符号。这一负面语义的构建与扩散,伴随中国革命运动的推进逐步加剧,既是帝国主义遏制中国变革的政治手段,也成为其联合军阀镇压革命的舆论工具。

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势力开始系统地对“红色”负面话语进行建构与输出,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突出。1921年,天津《益世报》根据日报所载内容报道:日本宪政会加藤总裁“竟谓我国已感受赤化,主张与列国共同防止”。在他看来,“中国如感受过激化,而我国(日本——引者注)及朝鲜之治安,恐受有影响。”^[21] 这种攻击并非单纯的舆论抹黑,而是帝国主义遏制中国革命、维护在华特权的政治手段。日本帝国主义将“赤化”“过激”的标签强加于中国革命运动之上,试图联合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因此,“赤化”通常与“过激化”相联系,含有消极意

蕴,并被帝国主义作为舆论攻击的工具。

国民革命时期,国内民众呼吁社会变革的政治诉求愈发强烈,革命力量将斗争矛头直指旧秩序。为遏制这一趋势,帝国主义对“红色”负面话语的建构也随之升级,并与军阀势力结成“反赤联合战线”,将“反赤”舆论升级为暴力镇压,进一步固化“赤”及相关词汇的负面语义。1925年,随着五卅运动的开展,帝国主义列强及军阀的“反赤”氛围更为强烈。陈宝麟在《京报》中指出:“此次风潮,英人诬我工人及学生为过激派,其所持之理由不过以工人组织工会,纱厂罢工,学生应援工人,遂谓工人为染有赤化色彩,学生则为过激派。”^[22]

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的“红色”负面话语建构不断从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延伸,军阀成为其实施暴力镇压的直接工具。1925年12月,军阀李景林便公开通电“讨赤”,声称冯玉祥助长赤化风潮、扰乱国家,必须及时剿除,甚至宣称此次讨伐不问敌友,只以是否“赤化”作为判定标准。

通过帝国主义对“红色”话语的赋义、渲染与落地,“赤”及其相关的词汇如“赤化”“过激”等已具有相当的负面语义,形成了对革命运动一定程度的舆论压制。

(二)国民党话语下的对立语义:“红色”与“恐怖”关联

随着国民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红色”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宣布国共合作走向破裂,“红色”概念在国民党话语体系中被赋予强烈的负面色彩,逐渐与“恐怖”语义深度绑定,成为其丑化共产党、构建政治对立的话语工具。

国民党基于“赤化”本身的负面语义,对“红色”话语进行持续的污名化建构,斥责中国共产党为“赤贼”,其活动为“赤色恐怖”,本质上是通过争夺舆论主导权,进而巩固自身统治。1927年7月,国民党机关刊物《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赤色恐怖下之湖南》一文,指责中国共产党“乃得在湘省大试验其舶来品造成恐怖局面,流氓地痞既与土豪劣绅无殊”^[23]。同年12月,北京《晨报》的《汉江重现赤色恐怖》一文渲染中国共产党的恐怖氛围:“共产党毁纱厂杀市民”“共产党又编武装队,冀造成大恐怖”^[24]。显然,国民党不仅通过机关刊物斥责中国共产党,而且运用主流媒体的舆论攻势大肆宣传“赤色”的负面语义,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刻意放大“赤”的负面意象,宣称“赤”代表流血、杀戮与

残酷,并声称其青天白日旗中的青色象征和平,白色象征自由,红色象征博爱,试图从象征符号层面否定、消解革命意义上的红色话语。

为割裂自身旗帜色彩与中国共产党的关联,国民党曾刻意制造“红”与“赤”的语义对立。《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周刊》刊载《“红”与“赤”释别》一文,指出“‘红’是象征勇敢与热烈”“‘赤’是象征激暴与野蛮”^[25];然而,二者在视觉呈现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终究无法消解国民党对“红色”的深层恐惧。这种恐惧最终外化为严苛的禁令。当时广东政府不仅禁止使用红色旗帜,甚至连红色标语也被明令禁止张贴。从刻意区分“红”与“赤”的语义,到全面封禁“红色”,本质上是国民党在话语层面将“红色”与“革命威胁”深度绑定,进而赋予其“恐怖”的消极内涵。

(三)国内社会认知中的消极语义:“红色”与“共产公妻”联结

在近代中国社会关于“红色”概念的认知体系里,“红色”除被贴上“过激”“恐怖”等标签外,其另一重消极语义表现为与“共产公妻”相关联。这种认知偏差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当时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遍认知之中。

彭湃曾就海丰地区“五一”劳动节的活动细节留有记载: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们手举有“赤化”二字的红旗游行,竟引得当地绅士误以为共产公妻之制将行^[26]。这一细节折射出当时传统绅士阶层对“赤化”概念存在认知盲区:由于缺乏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准确了解,仅从字面或片面传闻出发,将“赤化”与被歪曲解读的“共产公妻”绑定,进而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学生群体的革命表达与绅士阶层的恐慌反应形成鲜明对比,深刻揭示了“赤化”在基层社会认知中的消极异化。

这种认知偏差并非局限于基层士绅,而是蔓延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天津《大公报》中《共产党在华失败之批判》一文提到:“普通社会,初不知共产主义作何解,而就‘共产’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于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27]这段论述清晰地点明了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普通民众缺乏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系统认知,只能凭借“共产”二字的字面意思进行主观臆断,将其曲解为“掠夺他人财产归己所有”;另一方面,在信息传播不畅、负面传闻泛滥的语境下,“共产”与“公妻”被刻意捆绑传播,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共产主义及相关概念(包括“赤化”)的恐惧与排斥。

20世纪20年代,“红色”概念在帝国主义话语

的抹黑污名、国民党话语的对立丑化及国内社会的认知偏差中,被赋予“过激”“恐怖”“共产公妻”等多重消极语义,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话语工具。在此多维语义困境下,中国共产党需要且有必要建构“红色”的正面语义,为其赋予契合革命实际的精神内核与价值维度,从而为革命斗争获胜争取力量。

三、“红色”的正名: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构

20世纪20年代,面对“红色”概念的多重语义困境,中国共产党通过语义承接、话语对抗、概念转向、体系构建的方式主动建构“红色”的正面含义,并结合自身实际构建契合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际的“红色”话语体系。

(一)语义承接:“红色”概念的早期建构

建党初期,在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中,“红色”被赋予了“过激”“激进”的负面语义内涵。然而,中国共产党并未对“红色”的语义指向予以断然拒斥,而是结合自身的革命目标与现实需求,逐步实现了对“红色”政治含义的构建与运用,此过程呈现出显著的渐进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承接和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体系。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布第一个纲领,其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28]1}这显然是吸纳了列宁关于颜色象征不同党派属性的政治话语。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前人政治话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语义对“红色”话语进行改造。1921年12月,李大钊在北京中国大学演讲,以颜色区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称共产主义为纯赤色,社会主义为浅红色^[29]。这里“赤色”的政治象征对象专指坚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再泛指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传统语境中“赤”与“红”的本义,拓展了“红色”的政治内涵。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并未受当下“红色”消极意涵的影响,在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知方面具备一定的先进性。更进一步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剖析当下革命实际情况,明确了革命对象与革命力量,进一步丰富了“红色”的革命内涵。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了革命对象与革命力量,并动员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28]134}。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中有“这个全世界革命的工会的统一联合,就是赤色工会国际。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上面的原则组成工会带到赤色工会国

际旗帜之下”^[28]¹⁵³的表述。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有“无产阶级少年赤色的国际团体”^[28]¹⁵⁷的表述，此处“赤色”作为修饰词使用，代表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赤色”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受当时“红色”负面语义的影响，而是敏锐地洞察到其争议背后的政治矛盾，并将其转化为揭露国民党妥协本质的舆论工具。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文中指出，国民党因顾虑“赤化”嫌疑以及外国报纸的“过激”指责，对于军阀与外国资本家压迫工人的行为，未作出应有的反应，且“不但不敢与民众接近，更是不敢与苏维埃俄罗斯接近”^[30]。这种对舆论话语的反向运用，既揭示了国民党“革命”的虚假性，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阶级立场，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凝聚革命共识、推动革命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话语对抗：揭露“反赤”的本质

国民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作为具有“红色”属性的政治力量，帝国主义及军阀将攻击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反赤”风潮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形成了抑制，在此情形下，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开展话语反击。

首先，中国共产党深刻揭露了“反赤”运动的反动本质。陈独秀曾明确指出，所谓“反赤运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联手遏制中国国民运动的策略手段：“他所要镇压的实际上是国民运动，而表面上却以镇压‘赤化’‘过激’‘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名义出之。”^[31]事实也证明，帝国主义的反赤运动是反动的、反革命的：“赤俄已经把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驻兵中国及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倒是反赤的英美日等，不肯放弃这些不法的特权……”^[32]可见，只要是反帝国主义者或对帝国主义不利的，都被加以“赤化”之名。但事实上，帝国主义及军阀所反的“赤”反而是革命的、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利用“赤化”的语义矛盾攻击帝国主义的反动行径，一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反赤”的反动本质，另一方面阐明了“赤化”所承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涵。

其次，中国共产党揭示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反赤”的真实目的，并提出了具体对抗“反赤”的策略。1926年5月，中共中央在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时指出：“帝国主义者为他们自己在华既得权利之保障及继续发展，其势必然要尽量利用一切反赤势力之联

合，以铲除中国所有赤的势力，好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永远消沉下去，不至死灰复燃，这才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赤运动之全部企图及其成功。”^[33]中国共产党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反赤”的真实目的：阻碍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保障他们自己在华既得权利的继续发展。同时，针对反动势力的“反赤”行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明确的应对策略，即联合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组建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统一战线。“赤的战线即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线，要想不为帝国主义的反赤战线所破坏而获得最后胜利，第一要紧的是充实巩固自己的联合战线。”^[33]

最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新的话语体系，以革命的“赤”对抗反革命的“白”。1926年瞿秋白在《新青年》发表《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一文，他运用“赤”“白”对立的话语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第三共产国际便是一切赤化阶级的世界结合，国际联盟便是一切白化阶级的世界结合。”^[34]同时，他也明确表示白化“是屠杀、是掠夺、是帝国主义”，赤化“是反抗、是解放、是世界革命”；认为白化所代表的是列强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赤化所代表的是各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的利益^[34]。可见，中国共产党运用“赤”与“白”的话语体系进行阵营划分，明确“赤化”的无产阶级属性与“白化”的帝国主义反动本质，为中国革命话语提供世界视野。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化运动，并未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行动的破坏而消沉，始终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

（三）概念转向：从“赤”到“红”的革命话语确立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在国民党的话语语境中，“红色”语义在原有的“过激”内涵基础上进一步负面化，演变为“红色恐怖”表述。彼时，中国共产党已积累了一定的革命经验，面对国民党的话语攻击，深刻认识到构建自身革命政权与话语体系的关键价值，推动“红色”概念从抽象语义转变为具象符号。

中国共产党通过分析革命形势，明确了革命对象，用“白色”与“红色”进行话语对立，从而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就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发表宣言：明确将蒋介石定性为“屠戮工农与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罪魁”，同时指出“他们已经采白色恐怖屠杀政策宣布阶级战争了”^[35]。中国共产党已明确认识到，国民党已经脱离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走向“红色”的对立面，走向反动的

一方。

基于这一政治判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拥有自身的革命政权,建构独立的革命话语体系,举起代表自身政权的旗帜。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代拟中共湖南省委致中共中央的函件,指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应该“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36]。同年9月19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案,认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37]507},“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37]508}。此时,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放弃国民党旗帜已是革命形势的必然。同年11月,尹宽通过阐述某广州工人代表的观点——“拿下代表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举起我们的镰刀斧头红色旗”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只有举起自己的红旗,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才能“领导全被压迫的人类到光明的大道上去”^[38]。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红色”话语的使用频次逐渐超越“赤色”,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四)体系构建:围绕“红旗”“红军”“红色政权”塑造话语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早期探索进程中,“红色”并非仅仅是一种视觉象征,而是逐步演化为承载革命信念、军事力量以及政权愿景的核心话语要素。伴随工农革命军率先举起“红旗”,“红军”这一称谓在实践中开始萌生,“红色政权”于割据区域得以稳固确立,这三者相互支撑、有机整合,最终构建起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际相契合的“红色”话语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打出“红旗”之后,“红军”的称谓应运而生。1928年5月25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将割据区域内组建的军队正式命名为“红军”,原工农革命军的称谓被取消^{[39]218}。同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依据此前发布的《军事工作大纲》相关规定,明确指示:“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39]234}“红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的正式称谓,其内涵也逐渐丰富,成为代表工农利益、践行革命使命的象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秋收起义后,开始在一些地区建立工农政权,这些政权后来被称为“红色政权”。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这是红色政权的早期实践形态。1928年10月,毛泽东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对“红色政权”的存在条件和意义进行了深入阐述^[40]。此后,随着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等多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纷纷成立。这些政权以工农群众为主体,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剥削,成为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新型政权形态,被统称为“红色政权”。

从红旗的树立彰显革命立场,到红军的命名规范武装力量,再到红色政权的创建与理论阐释,中国共产党逐步构建起逻辑严谨、内涵丰富的“红色”话语体系。红旗作为视觉象征,是“红色”话语体系的外在表征,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信念与奋斗愿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红军作为武装力量,是“红色”话语体系的实施载体,凭借革命武装斗争捍卫红色政权,将话语内涵转化为实际的斗争动力,是衔接话语与实践的关键主体;红色政权作为制度形式,是“红色”话语体系的实践根基,通过推行革命政策、维护工农群众权益,使革命话语具有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与实践支撑。三者以“红”为精神核心,以革命实践为基础,将符号表征、武装力量与制度形式有机整合,构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红色”话语体系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与发展路径,又塑造了有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型革命话语,为中国革命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与组织保障,其蕴含的理想信念、为民宗旨、斗争精神等精神特质,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的重要起源。

四、结 语

纵观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中的“红色”概念,其不仅是表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政治符号,更是凝聚中国革命力量的精神标识。通过对这一时期“红色”概念演变历程的梳理可知,概念与历史环境之间始终存在一种互动关联。历史语境为概念赋予现实指向性,概念建构则反向塑造历史进程的价值取向与行动逻辑。这一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活实践,深刻彰显了“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红色”最初由颜色词汇逐渐衍生出政治语义,并被纳入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这既是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现实需求的响应,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红色”所蕴含的光明、明亮等内涵的创造性转化。在20世纪20年代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中国共产

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红色”话语的核心要义与中国本土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语境下“红色”的文化内涵相结合，逐步实现了对“红色”概念的重塑与构建。“红色”渐次成为凝聚革命力量、引领群众运动、区分敌我的精神标识，为早期革命动员与组织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话语支撑，也为“红色”在中国革命语境中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学理性奠定了基础。在当代语境下，这一历史过程所蕴含的话语构建经验，亦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启迪。

本文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共产党“红色”话语建构历程为主线，从微观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展开探析。研究以“红色”语义变化为切入点，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历史进程中，深入剖析该概念内涵变迁的深层次历史原因，从而弥补宏观叙事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然而，本文聚焦于 20 世纪 20 年代“红色”话语体系的发展，未分析不同革命区域、社会阶层对“红色”话语的接受差异，以及“红色”与其他核心革命话语的关联性建构。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时段，基于不同地域、阶层与群体的微观史料，深入剖析“红色”话语的传播路径与接受逻辑，厘清其与“革命”“工农”等核心概念的内在联系，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提供相应的历史借鉴与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9.

[2] 陈良. 从“赤”到“红”：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红色”词义的演变[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4(4)：81-95.

[3] 苏全有，郭德荣. 论 20 世纪上半叶“红色”意蕴的政治转化[J]. 安徽史学，2023(5)：67-74.

[4] 张治江. “赤化”是如何革命起来的？[J]. 安徽史学，2019(4)：79-88.

[5] 王建伟. 试析北伐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赤化”和“反赤化”的评述[J]. 中共党史研究，2010(4)：45-54.

[6]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212.

[7] 姚小平. 基本颜色调理论述评：兼论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演变史[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1)：19-28.

[8] 饮冰. 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J]. 新民丛报，1904，3(11)：61-67.

[9] 记日本审判社会党[J]. 东方杂志，1910，7(11)：62-64.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 1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68.

[11] 高劳. 俄国大革命之经过[J]. 东方杂志，1917，14(5)：35-43.

[12] 罗罗. 德国社会革命与斯巴达克斯团[J]. 东方杂志，1919，16(4)：59-62.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 乐峰. 俄国宗教史：下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41.

[18] 列宁. 列宁全集：第 2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3.

[19]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0]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1] 加藤氏对我国之谬误[N]. 益世报，1921-01-28(7).

[22] 陈宝麟. 英国之赤化与过激党[N]. 京报，1925-06-14(7).

[23] 赤色恐怖下之湖南[N]. 广州民国日报，1927-07-16(7).

[24] 汉江重现赤色恐怖[N]. 晨报，1927-12-04(2).

[25] 舫. “红”与“赤”的释别[J].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周刊，1927，1(6)：11.

[26] 彭湃. 彭湃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2.

[27] 共产党在华失败之批判[N]. 大公报(天津)，1927-07-01(1).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9]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30]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86.

[31] 独秀. 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J]. 向导，1925(105)：1-2.

[32] 实. 寸铁：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J]. 向导，1926(152)：11-12.

[33] 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J]. 向导，1926(155)：1-2.

[34] 瞿秋白. 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J]. 新青年，1926(5)：10-27.

[35]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J]. 向导，1927(194)：4-6.

[3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 1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29.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4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8] 尹宽. “拿下青天白日旗，举起镰刀斧头红色旗！”[J]. 布尔塞维克，1927，1(4)：9-13.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5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56.

(责任编辑：陈丽琼)